刻纸留痕四十年（四）

改革开放几个“关键时刻”

□ 冉 昊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
人民出版社出版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如果没有邓小平指导我们党作出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我们国家要取得今天的发展成就是不可想象的。

40年改革开放，如同在茫茫大海中行舟，几度风雨，几经波折，曲折前行。

从《邓小平文选》第二、第三卷那些平实而生动的文字中，我们能够看到其间的云诡波谲和历史沉浮，可以重温改革开放的几个关键时刻。

冲破思想教条的关键时刻

有段时间，教育科学领域“两个估计”（即“文革”前十七年科技教育战线执行的是“修正主义路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长期蔓延，造成教育科学领域一团泥泞、死气沉沉。

1977年7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复出，他主动要求分管教育科学工作。他在正式复出前后的多次讲话都涉及到教育科学领域，在《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中认可教育科学战线“主导是红线”，并且在《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一文中推翻所谓“教育黑线专政”论。由此，党扭转了多年来对知识分子“左”的政策，知识和知识分子重新受到重视，思想创作、思想创新逐步活跃起来，还恢复了被“文革”中断多年的高考制度。这一系列举措，不仅为党和国家的“储才”“养才”奠定了基础，更是开时代之先的“思想启蒙”。

1978年5月，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和《光明日报》先后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因它同“两个凡是”尖锐对立，触及盛行多年的思想僵化等问题，受到当时一些上级领导的指责，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面临着“中道崩殂”的危险。在这个关键时刻，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对讨论给予了及时的支持，提出“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中央各部门、地方和军队的负责人相继发表讲话或文章支持讨论，局面为之一变。由此，中国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桎梏，为中共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奠定了基础。

坚持基本原则的关键时刻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此后的一段时间内，一些人仍然受“左”的思想束缚，对新的路线方针政策表现出不理解甚至抵触，甚至有极少数人曲解“解放思想”的内涵，夸大党所犯的错误、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对于这股违背客观历史事实的思潮，1979年3月，在以中共中央名义召开的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邓小平发表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的讲话，一方面充分肯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关于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另一方面从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全局的高度，重申并深刻阐述了在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此外邓小平还提出，“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1979年11月，党中央决定着手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时候，关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又成为争论的焦点之一。对于这个关键性问题，邓小平在《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的讲话中实事求是地指出：“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稳定了民心军心人心，并为后来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牢不可破的基础。

坚定改革信念的关键时刻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巨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在全球大变动、大改组的格局下，我国经济发展中一些深层次矛盾逐步暴露，经济增速有所放缓。在这一背景下，一些人对社会主义的前途产生怀疑，对改革开放能否继续推进缺乏信心，对能否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出现徘徊观望。

在这又一历史关键时刻，1992年1月、2月邓小平南巡并发表重要谈话，收录于《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对于那些观望徘徊、生怕犯错而丢掉“乌纱帽”的人，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对于那些“左右”犹疑的人，邓小平指出：“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在关键时刻坚定了中共始终推进改革开放的信念，进一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对那些质疑改革开放、怀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消极情绪予以坚决回击，把改革开放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时至今日，改革开放仍在继续推进。那么，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以来几个关键时刻的决断，给了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关键时刻要冲破思想教条和坚定改革信念，就要做到解放思想。离开了这一条，正如邓小平所说，如果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么改革就没有了生机，就要亡党亡国。关键时刻坚持实事求是，就要做到敢于担当。离开了这一条，因循守旧、安于现状，人人都争当“四平八稳的‘不倒翁’”，那么改革就会丧失动力、甚至走向衰亡。

我们相信，只要秉承解放思想和敢于担当的精神，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就一定能长风破浪、披荆斩棘，在新时代取得更大的成绩！**（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副教授）**

邓小平到外地考察工作

精确反映新留学青年

□ 廖元辛

改革开放以来，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学生、学者和工人前往美国学习、工作和生活。其中人数最多的是留学生。据2017美国门户开放报告统计，仅在2016-2017学年，就有35万名中国学生前往美国的高等教育机构学习。

无论是准备一毕业就回国，还是留美国工作几年再离开，抑或选择在美国定居乃至入籍，这些留学生来到美国，就是选择了一种与自己的成长环境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选择了面对、接触乃至融入一个新的社会。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有怎样的思考与感受，享受过哪些欢乐，又经历了哪些身处国内的父母和朋友难以想象的痛楚与心酸？他们在美国为什么笑，为什么哭，又以一种怎样的方式谈恋爱？他们在异国他乡、在远离城市的“大学城”里是否感到孤独？他们想家吗，他们想回到中国吗？如果想，为什么很多人依然决定留在美国？

这些问题，需要有人记录和回答。如果我们不真正走进一个个普通留学生的内心，不能把这些问题回答清楚，我们就无法真正理解他们，也无法真正理解这几十年留学热的意义。

作为记录者，我是有一些雄心的：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写作，去描述、揭示甚至反思最近二三十年的留学浪潮——这些人为什么要出国，他们在美国获得了什么，他们在留学浪潮中是被席卷、被挟裹、甚至被吞噬，还是“在风口浪尖紧握住日月旋转”？为此，从2015年底到2016年7月，我走访了美国30余所高校，访问了百余名不同背景的留学生。他们中，有些人我原本熟识，有一些是头一次见面。但无论远近疏亲，他们都真诚地向我敞开心扉，将这些年在美求学的酸甜苦辣娓娓道来。在饭桌上，在学校里，在他们或整洁或凌乱的住处，我与他们交谈、欢笑，为他们讲述的哪怕一点点微不足道的收获而感到欣慰，也为他们初来异乡时备受孤独的煎熬而心酸落泪。

在采写的过程中，我不断遭遇人们的质疑。他们问我：你所采访的这些人，是否真的具有代表性？我承认，对于采访的对象，我没有面面俱到，也不可能面面俱到——我没有采访中途退学的学生，也没有采访沉迷游戏不能自拔的少年；我没有采访成功申请哈佛的留学生如何登堂入室、面试牛人怎样在美国升值加薪的，也没有采访受父母委派来美“镀金”，准备接手家庭企业的“富二代”。我无数次扪心自问：如果这些形形色色的年轻人最终缺席，那么我的努力，究竟是一种见微知著的以小见大，还是不自量力的管窥蠡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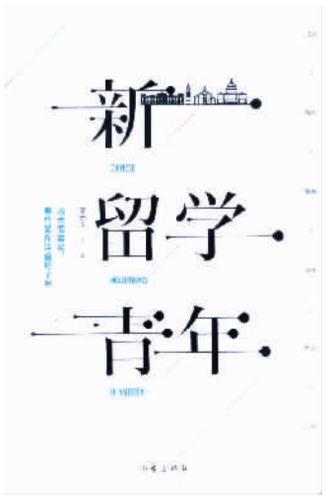
这个问题，一度困扰了我很久。直到一个偶然的机会，央视《今日说法》曾经的栏目主编魏大航告诉我，做节目、拍电影，你要先把自己琢磨透了，要把你周围的人琢磨透了，要具备“把自己放平成一名观众的能力”。我想，写作大概也是如此。在站到更高视角去观察思考之前，要先理解自己，理解周围的人，这是一切的基础，从某种意义上也是这一切的最终归宿——只有我们理解了自己，理解了自己身边的人，我们才能理解我们所置身的这个时代。

2017年，我结束了采访工作，利用半年左右的时间，重新整理了这百余位受访人的采访记录，从中选出一些令我印象深刻的故事。结合自己的留学体会和采访心得，我把它们写成了20余篇，分成六个主题呈现给读者。在为当代人留下小传的同时，我也希望以此增进国内读者对留学生这一群体的认识。我真诚希望那些正在计划留学的年轻人（以及他们的父母），可以从这本《新留学青年》中，看到一幅更为真实、客观和丰富的留学图景。我也真诚希望，那些正在留学生活中感到孤独、压抑或迷茫的年轻人，可以从这些同龄人的经历中，获得些许信心与力量。

记得采写之初，我曾问一位在美国读新闻的朋友：“什么样的写留学生的书，你会有兴趣一读？”

她的回答只有两个字：“精确。”

精确，是一件笨重的事情。我才疏学浅，却依然愿意一试。



廖元辛著　作家出版社

『名著』会被时间再淘洗

□ 赵 强

读者之声

近来有点空闲，我重燃了阅读名著的愿望之火。记得从1978年我考进南开大学后那整整4年里，我如同前苏联大文豪高尔基所形容的那种读书状态——“如同饥饿的人扑向面包身上”，发疯似地每天雷打不动阅读中外经典著作3个小时，内心受到巨大激荡和震撼，精神世界也得到了极大慰籍和滋润。这感觉至今难忘。

遗憾的是，这种阅读名著的美好感受，工作30多年来竟很少再出现。不知是缺少了当年年轻时的那种阅读激情，还是现在的出版物值得反复阅读的太少，抑或在纷乱的年代里，阅读已不再是人们的精神必需，给阅读的时间、空间都太少？

我饶有兴致地将自己的上千册藏书一一翻检出来，想选择适合阅读的。这一翻不要紧，竟发现偌大的藏书中，很少能挑出几本值得再读的。不知是翻译的原因，还是时代隔得太远，反正提不起任何阅读的欲望。再看过去我们所推崇的一些现当代文学作品，若用当代人的审美眼光来观照，其中不少似乎也分量不够。

名著是需要一定时间淬火确认的。记得几十年前读过《红与黑》作者司汤达说过的一句话，他在100多年前预测：“百年之后必有知我者。”很多名家在世时都发出过这样的预言。我以为，当时是名著并不代表今后一直还会是名著。名著不是自封和热捧出来的，它需要自己从众多的出版物中脱颖而出。有的名著虽然不温不火，但是说不定哪天它的影响力就会铺天盖地。也有的名著，虽曾火爆一时，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发现它的思想与艺术穿透力较差，不能引起当代读者的共鸣，它的影响力也会逐渐失去，作为曾经的名著而留存。

如今中国进入出版物过剩的时代——每年出版20万种新书，实在太多了，但是许多人还是喊着没有好书看，缺少反映这个火热时代的力作和名篇巨制。这个巨大的数字，对读者的日常选书、读书，是一个严峻的阅读选择的挑战！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出版物中很大一部分将会被淘汰。

究竟有多少好书值得我们忠诚守候？有多少名著值得我们，包括未成年人去花大力气读下去呢？

我认为，名著值得再筛选、再评介。专家和出版机构都应拿出胆量来，将那些混进名著队伍中的伪名著、假名著、准名著悉数砍掉。如此筛选名著，并不是不尊重历史，而是将其中对当代人有益的拿出来，而读者也会在这种跨时空的阅读中，心灵得到滋润，灵魂得到净化。

不管怎样，名著必须让人能读下去。读不下去的，不管它的名气有多大，也绝不奉陪。按此标准，我挑选了契诃夫、莫伯桑、司汤达、茨威格等名家的小说重读，确实都力透纸背，令人回味无穷。

的确，还有多少名著不需要再读呢，那确实需要因人而异了。各类社会阅读专业指导机构、出版机构、专家学者也应当在此方面多多发力。

“薛涛大奖作品外译丛书”国际推广

2018年11月9日至11日，第六届中国上海国际童书展在上海世博展览馆举行。上海童书展既是童书出版与儿童内容相关产业从业者的大聚会，也是孩子们一年一度的阅读狂欢季。

童书展上，中译出版社举办了“薛涛大奖作品外译书系”国际推广启动仪式。国际儿童读物联盟（IBBY）主席张明舟，国际儿童读物联盟（IBBY）副主席、俄罗斯功勋画家安娜斯塔西亚·阿卡普瓦、国际安徒生奖评委会主席横田纯子相继致辞，肯定薛涛作品的文艺价值、鲜明特色和国际化特质，安娜斯塔西亚·阿卡普瓦向薛涛赠送了二人合作、刚刚出版的俄语插图版《河对岸》。

薛涛现为辽宁文学馆馆长、辽宁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委员，中宣部立项资金支持薛涛作品海外版权推广。他的作品具有鲜明的东北地域特色，充满丰富的想象力和冒险精神，语言诙谐幽默的同时，蕴含着细腻的情感表达和温暖的人文关怀。他的作品在日本、美国、越南、韩国等国出版。“薛涛大奖作品外译丛书”收录《小城池》《正午的植物园》《满山打鬼子》等。丛书将延揽资深英美译者翻译为英文，以电子、有声等形式多维度开发，并致力于多语种版权的对外输出及推广。

（赵 青）

“汉语盘点2018”启动

从“枫桥经验”“上海精神”“广深港高铁”“港珠澳大桥”“贸易战”“进博会”“税”“电竞”到“XXX了解一下”“官宣”“土味情话”“中年少女”“佛系青蛙”“C位出道”，哪些流行语能概括即将过去的2018年的“大事”“小情”，描述中国视野中的社会变迁和世界万象，回味起来让人会心一笑？

近日，由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商务印书馆、人民网、腾讯公司联合主办，央视新闻、微博、北京语言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协办，贵州茅台酱香酒有限公司提供商务支持的“汉语盘点2018”在京启动。活动还特别推出“改革开放四十年四十词”专题。11月20日至12月3日，网友可通过人民网、腾讯新闻客户端、央视新闻微信客户端、商务印书馆官网等平台推荐“年度流行语”“年度新词语”“年度网络用语”。12月9日起，网友可通过PC端活动专区或手机投票选出各组第一的字、词。参与活动即有机会现场见证年度字词的诞生。

（小 章）